目　录

国民党湖南甲乙派的斗争……刘岳厚（1）
程潜、赵恒惕驱逐谭延闿和李仲麟等之死……姚大慈（40）
湖南两次驱赵亲历记……唐希抒（52）
北伐军在常德解决袁祖铭的经过……罗子雯　胡　达（59）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围剿"……谢慕韩（63）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围剿"中的龙
　岗战役……戴　岳（70）
抗日时期国民党的"湘鄂赣边区"……刘公武（75）
国民党苏浙皖边区挺进军总部见闻……刘漱石（87）
蒋帮勾结日伪反共的一幕丑剧……杨思义（93）
记上海黄金风潮案……何汉文（98）
我所知道的汤恩伯……宋　涛（117）
复兴社的军事处及护卫队……蔡杞村（132）
蒋军第八十五军在淮海战役中被解决经过……吴绍周（146）
淮海战役中蒋军第八十五军二十三师的投诚……黄子华（157）
李弥兵团被歼记……黄　健（168）
回忆陈作新……阎幼甫（188）
记汤芗铭屠杀杨德邻等……萧仲祁（203）
辛亥组织海军陆战队会攻南京和北伐经过……王时泽（206）
短稿三篇
　郭人漳欺诈取财……余焕东（21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辛亥湖南光复时的《大汉民报》……刘　荚(212)
思贤讲舍、长沙府学宫之设局刻书……彭　靖(213)

补充和订正

禹之谟事迹补遗……文　斌(216)
关于萧昌炽和廖家栋……姚大慈(217)

国民党湖南甲乙派的斗争

刘岳厚

甲、乙派是湖南国民党内部矛盾产生出来的两个反动派系；它是由“小组”与“反小组”发展起来，存在于何键统治湖南时期——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间，随着抗日战争的兴起与何键的下台而结束的。两派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年纪较大的人都知道有甲、乙派的斗争，但明了其内幕的人可能不多。笔者当时曾参与这一斗争，并且是乙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现就回忆所及，将甲、乙派的形成过程和斗争经过写述出来，以保存有关这一事件的史实。

一、大革命失败后湖南党务派系斗争的萌芽

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湖南的军政和党务大权，都掌握在唐生智手里。“马日事变”以后，彭国钧、仇鳌等一度组织救党委员会，拥蒋反共；旋为唐生智所解散，成立省党部改组委员会；前省党部内的革命派委员退出，唐生智的部下“佛化”分子冯天柱、尹松乔等充当了改组委员。国民党的省领导人“佛化”了，党的群众和青年学生不能不随之表示皈依佛法，一时“佛化”运动风靡全省。唐生智为什么要搞“佛化”呢？据他的部下邓寿荃告诉我：“佛化是孟夫子（唐生智别号孟潇）治理军队维系军心的一种策略。孟夫子常常说，他是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为己任。

因此，当时佛化运动不但风行湖南，而且随着唐所部北伐军已经扩大到了武汉。”我还记得当时有所谓“佛化党化二位一体”，“唯心唯物两极相通”等奇怪的说法。这种现象，在马日事变后颇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大多数青年学生所不满。周百八、黄庭荫、米世珍等人暗中组织反“佛化”运动，已隐然树立起两个精神壁垒；不过一时不敢公开，斗争尚不显著而已。不久，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和湘军程潜组织西征军由南京西上进攻武汉，唐生智军败退，两湖政权落于桂系手中，湖南主席由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程潜兼任。于是湖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被撤销，“佛化”与“反佛化”斗争也归于消逝。这次“佛化”与“反佛化”的斗争，虽然为时甚短，却为湖南党务的派系斗争开创了先河。

一九二八年四月，湖南省党部成立指导委员会，委员为彭国钧、张炯、李毓尧、王凤喈、刘岳峙、刘召匾、陈嘉任、罗介夫、张定等九人（后来张定退出，由袁同畴补充）。上述诸人中彭（国钧）、张（炯）、李（毓尧）、王（凤喈）多系湖南学阀出身，彼此臭味相投，无形中成了一个宗派集团，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小组”。彭国钧等在政治上原来与蒋介石和桂系均无多大关系；刘岳峙、刘召匾二人则属于桂系，接近西山会议派；刘岳峙长财政，刘召匾长建设，既有党权，又握政权，他们在马日事变前即已与陈嘉任等联合，组织了一个“左社”，与彭、张、李、王时常发生摩擦；惟当时双方均无群众基础，也缺乏骨干，因此，斗争壁垒尚未显著形成。

1928年5月，程潜被李宗仁软禁于武汉，鲁涤平继任湖南省主席。鲁对湖南党务持不介入态度，一任彭国钧等为所欲为。彭、张、李、王利用这个机会，更凭借过去多年办学的关系，大肆罗

致学生，广植干部，最显著的如一九二八年八月招收各县党部指导委员，张炯利用组织部长的权力，排除异己，网罗了过去一些反“佛化”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骨干，派充各县县党部委员。这样彭张“小组”就为他们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把持湖南党务奠定了基础。此外，彭张“小组”还具有一个独特的优越条件，这就是彭国钧与当时湖南的大封建势力集团有着特殊的关系。原来湖南自辛亥革命以后，出现有两大封建势力：一为谭延闿的“官僚政治势力”，一为胡元倓的“明德学阀势力”。这两大封建势力的首脑谭延闿、胡元倓二人又是莫逆之交，因此，这两派势力经常结合一起，在湖南政治舞台上起操纵的作用。谁和这两派发生关系，得到他们的支持，谁就在政治上占便宜。彭国钧是明德学生，又是胡元倓的智囊，同时也是谭延闿的亲信；另一方面，鲁涤平是谭延闿的实力干部，彭与鲁又特别接近；在这种情况下，彭国钧很自然地成了他们集团中的中心人物。在历次的地方派系斗争中，彭等总是得到这两大封建势力的支持而占居上风，很少有人可以与之抗衡。

当一九二八年鲁涤平任湖南省主席时代，以彭、张为首的集团已经在党务上取得显著的优势。但却因此引起了省党部其他的人的不满，加以彭等胸襟窄狭，在人事上过于排除异己，不免激起很多人的反感。这就为他们日后的失败埋下了根子。一九二八年湖南“铲共”已达到高潮，而彭国钧等犹以为未足，企图继续推进，于是声浪越搞越大，范围也越搞越宽，由铲除共产党员而排斥改组派，而怀疑到一切不属他们集团的国民党员。属于改组派的周圣工、米世珍等竟由省指导委员会拖出交由铲共法院审判，执行枪决（周圣工系组织部秘书，米世珍系湖南省党校教官兼省党部干事）。因此，彭张集团以外的国民党员人人自危，加上二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岳峙、召圃）嗾使，大家对彭张集团的仇视也与日俱增，不约而同地在大街小巷贴出打倒彭、张、李、王的标语。一九二八年底，省党部委员刘岳峙、刘召圃、陈嘉任、罗介夫、袁同畴等提出派粟日初等七人为党务视察员，分赴各县活动，以图造成力量与彭、张集团对抗。恰在此时，湖南政局发生动荡，一九二九年二月，桂系挟武汉政治分会撤免鲁涤平，任何键为湖南省主席；不久，蒋介石下令讨桂，进军武汉，何键附蒋倒桂，桂系败回广西老巢。彭国钧等见桂系失败，刘岳峙、刘召圃等的冰山已倒，即指粟日初等七人为桂系分子，并以非法窃取视察员为口实，撤销他们的职务。不料竟因此构成党内派系斗争的导火线，掀起湖南空前未有的党潮——"反小组"运动。

先是有新化人李先教，因屡欲参加省党部的活动而屡被拒绝，对彭张等极为不满，至此见有机可乘，遂向其同乡湖南军界前辈当时任省自治筹备处处长的曾继梧大肆挑拨，争取支持；一面纠合党内不满意彭、张的人如文任武、易君左、伍薏农、邹谦、吴剑真、龚心印等一大群人向彭、张等人开火，指责他们在党内搞小组织，制造派系，把持党务。一九二九年春夏间，李先教、文任武等设"反小组"运动办事处于长沙市吉祥巷大吉祥旅馆，以发快邮代电等各种方式广事宣传，揭数彭、张等人的罪恶；粟日初等则于一九二九年三月赴南京中央党部请愿。这一"反小组"运动，在长沙方面，得到曾继梧、何键以及长沙警备司令李觉等的支持和鼓励。据文任武告诉我，反小组办事处的费用就是由自治筹备处供给的（文当时任该处科长）。而在南京方面则对彭、张集团有利。因为当时彭、张集团正在整个投向ＣＣ怀抱，得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保护；同时蒋介石也一贯采用以地方党部牵制地方政府的政策，对彭等自以青睐加之。因此，任凭李先教、

菜日初等如何反对，彭张集团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湖南党务的控制权。陈果夫、立夫兄弟也完全信赖彭、张等人对湖南党务的控制能力。当“反小组”和“小组”爆发斗争之初，他们曾向蒋介石保证：湖南党务有彭国钧、张炯他们领导，是不会发生问题的。不意为时不久，李先教等便啸聚党员群众一再捣毁长沙市党部和省党部的机关报——中山日报，并殴伤党委和党员20余人。蒋介石在河南见报，大为震怒，电责陈果夫。于是有国民党中央加派何键、王祺、鄢悌、曾杰等四人参加省指导委员会、整理湖南党务之举（这次国民党中央还加派了黄士衡参加指委会，但是黄士衡始终没有就职）。这是“反小组”与彭张“小组”斗争的第一个回合。这次斗争历时两月，“反小组”并没有取得胜利。彭张“小组”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固然没有改变，曾杰进省党部时还宣布开除“反小组”分子李先教、文任武、易君左、伍薏农等四人的党籍（曾杰骨子里是同情反小组的，这样作是一种姿态）。反之，彭、张方面在这次斗争中却锻炼和识别了自己的干部，明确了哪些是可靠分子，哪些是动摇分子；并且进一步取得了二陈的谅解，与ＣＣ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但ＣＣ和彭张集团在反对派的逼迫下，毕竟也作了一些让步，何键、曾杰的参加省指导委员会，就是这种让步的具体表现。

曾杰到湖南来，是胡汉民提出的。曾系同盟会会员，老气横秋，不可一世，常以“国叔”自居（曾说：他的资格仅次于孙中山，孙称“国父”，他应该称“国叔”）。这次他被派来湘，继张炯为组织部长，大权在握，由于他的基本态度是敌视“小组”，而同情“反小组”的，因此，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打倒“张家店”（指张炯的组织部集团）。每次省党部会议散会之前，曾杰照例由口袋内取出一纸任免名单，凡属被认为是张炯的骨干的各县指委，都用“调

省”名义免职，每次任免名单几乎都是没有经过讨论就得到通过。不到三个月时间，“张家店”被打得落花流水。张派人物怒气冲天，麇集省城，纷纷向南京提出控诉。二陈便藉口缓和湖南党派斗争，于一九二九年冬对湖南省党部的人事进行调整，将曾杰免职，改派了一个年轻的农林部科长谭常恺为省党部委员；并将权力最大、纠纷最多的组织部长一职畀予黄埔十三太保之一的鄢悌；谭常恺继鄢为宣传部长，王祺为训练部长，彭国钧、张炯等仍为常委不动。这次省党部局部改组对彭张集团是有利的：曾杰调走了，去掉了一个大障碍；彭、张虽未攫得组织部长一职，但鄢悌经常不在湖南，组织部长职务实际是由该部秘书沈遵晦（浙江人）代理；沈非本省人，年事很轻，经历不足，并且生活浪漫，大部分时间与女同事闹恋爱去了，对部里的事管得很少；这样，就给彭、张集团以随意操纵和从容布置的机会。所以这第二个回合的斗争又以彭张小组的胜利而告结束。

在这次斗争之后，“反小组”掩旗息鼓，彭张“小组”继续控制湖南党务，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一派专党”的局面；但斗争并未就此结束。以后，彭张“小组”被称为甲派，“反小组”发展成为乙派，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展开了新的斗争。

二、甲、乙派的形成和乙派的发展

在叙述甲、乙派的形成和斗争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甲、乙派名称的出来。甲、乙派的名称，不是双方当事人自己制定的，乃是人们加给而为双方所默认的。一九三三年秋湖南选举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彭国钧、张炯等为首的一方同以刘岳厚、毛飞、黄家声、刘宝书等为首的一方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湖南的小报和一些政治流氓除了在竞选中加油加酱，密锣

紧鼓，将竞选运动推上高潮，把长沙搞得乌烟瘴气以外，事后还为斗争双方送上两个新的名称——甲派和乙派。其中推波助澜最力的一人便是周翊襄。大概在选举过后不久，周就为斗争双方制造了两个简单的名称：称彭、张“小组”为甲派，称以刘岳厚、毛飞、黄家声等为首的集团为乙派（这是解放初期周翊襄在和作者聊天中自己谈出来的。以前作者不知道这两个名词的出处，还以为是《晚晚报》杜撰的。至于周是如何制造和传播这名词的，当时倒没有详细追问他）。周翊襄制造这两个名词之后，长沙《晚晚报》从而加以宣扬；并以“甲”字象形钻子，“乙”字象形皮刀，又给甲、乙派分别加上一个“钻子”和“皮刀”的外号。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九日《晚晚报》上有这样几句话：“湖南党务之有甲、乙派也，本报曾象其形而锡以皮刀、钻子之名，一时皮刀、钻子喧腾于一般人口中，两派人物亦皆直认皮刀、钻子而不讳也。……”为着迎合当时社会上的有闲阶级的消闲心理，争取报纸的销路，他们还不时报道（实际是鼓动）甲、乙派的斗争。于是，甲、乙派和“皮刀”、“钻子”一类名词，就经常在报纸上出现，逐渐为一般人所熟悉了。

乙派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

如众所周知，何键是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而取得湖南政权的。蒋介石为了羁縻何键，防止他倾向桂系，在1929年4月正式任命何为湖南省主席之后，又派他为省党部常委。但何在省党部内处境孤立，彭国钧、张炯等经常利用素有“王牛”之称的王祺在会议上对何大肆攻击，甚至拍案大骂，杯盘俱震。何虽深感不安，但不好如何发作，惟一的办法，就是在省党部内寻找友军。这时谭常恺年轻活跃，利用宣传部长头衔四出讲演，大肆活动，颇露头角；当时省党部其他委员都与何键格格不入，独谭对何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示好感，因此谭便成了何键寻找友军的理想对象。谭热中名利，虽然他之能够出任湖南省党部委员，系由于二陈的提拔，但在回湘以后，眼见靠拢何键，有官可做，有钱可抓，权衡轻重，宁舍陈而投何，一心倒向何键怀抱。后来谭果然得何键保荐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何之拉谭，无非是想在党务上增强实力。不过省指委九人中仅仅拉拢谭常恺一人，力量还是远远不够。谭常恺自投效何键以后，彭张等对他态度突变，他们原来对谭相当重视，现在则攻击不遗余力，连王祺对谭也由器重而趋反对；加上谭自身生活腐化，贪污公款，授人口实，社会地位日趋低落，在湖南党务上已失去作用，远不能与彭张等人对抗，这与何键原来寻找友军的目的又不符合了。

一九三一年秋，湖南省党部召开第三次省代表大会，选举成立第三届省执监委员会。这次选举，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指示，采用乙种选举法，即加倍选举执监委员候圈人，由国民党中央（实际是ＣＣ根据彭、张集团的意见）圈定。结果，张炯、何键、王祺、朱浩怀、谭常恺、黄家声、谢祖尧等被圈定为执行委员；彭国钧、彭运斌、刘宝书、孟庆暄、萧逢蔚等为监察委员；刘岳厚也被圈为候补监察委员。就中执委方面与何键接近的仅黄家声与谭常恺二人，而且他们二人只是个光杆委员，并无群众基础；刘岳厚虽因与何键有同乡关系得以列名候补监委，同样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何键在省党部内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

在第三届省执监委员会成立后，彭、张集团既保持了湖南党务的控制权，便念念不忘何键勾结桂系赶走鲁涤平的宿怨，随时抓住机会打击何键。党与政经常发生摩擦，形成对立局面。这个集团的主要人物如彭国钧、张炯、王凤喈、谢祖尧、曾省斋等均系当时教育界“知名之士”，省党部与教育界的关系至为密切，湖

南政治上发生问题，教育界总是和党部一致行动。这些人除了在省内对何键进行斗争以外，还联合南京方面的湖南人士如叶开鑫、贺贵严、唐生智等，网罗一些对何键不满的分子，进行反何活动。南京、武汉曾出现过许多反何团体和反何刊物如《洞庭波》、《大风报》之类（《大风报》的董事长是张炯，《洞庭波》的主办人是贺贵严的妹丈罗渭韬），攻击何键，不遗余力，说他政治割据，"非醴勿用"（何键是醴陵人，喜欢引用醴陵同乡。所谓"非醴勿用"，就是《四书》上"非礼勿动"这句话的谐声）。请愿控诉，不一而足。某次贺贵严曾策动湖南旅京同乡多人举旗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撤办何键，大有非达到推翻何键政权的目的不休之势。凡此种种，在何键看来，蛛丝马迹，都与省党部策动有关。何键对这些来自省内外的明枪暗箭，防不胜防，终日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安。要达到这个目的，则只有从党务方面积极培植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打垮彭张集团，把党务领导权夺过来，从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何键迫切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力量来与对方作斗争，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有这样一些具有政治野心、与何键有某种关系、而又对彭张集团不满的人，迎合何的意图，想搞组织活动；两方面一凑合，于是便产生了乙派。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早在一九二九年，谭常恺任湖南省党部委员兼宣传部长时，曾引用他的一个同学毛飞为宣传部秘书。毛飞为人也和谭常恺一样，热中名利。他见谭投靠何键以后，一帆风顺，由党而政，当上了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也想循谭的老路，先爬上省党部委员，再转身政界。于是运用他的同学ＣＣ骨干分子余井塘、许绍棣等的关系钻得省党部委员一席。彭、张集团因对谭常恺不满，迁怒到毛身上，认为毛是谭的谋士，倒谭必先去其党羽，借口毛

的妻子唐竹邨（湖南稻田女子师范毕业的交际花）涂脂抹粉，奇装异服，说毛行为不检，不配充当省党部委员，要求国民党中央党部予以撤换，以致演出在同一天之内毛飞上午宣誓就职，下午就接南京电令免职的滑稽戏。毛飞气极，然心不死。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湖南省第三届执监委员选举，毛飞又活动国民党中央监委会圈定他为湖南省监察委员，但最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四届中常会决议颁发的湖南省党部执监委员名单到省时，毛的监委又不翼而飞（《晚晚报》记载其事甚详），代替他的却是中监会原来圈定之另一候补监委彭张集团分子萧逢蔚。这么一来，毛更加恼火，决心死守湖南，寻隙报复。于是天天窥伺省党部的行动，向何键方面的殷德洋和我告密，并进行煽风点火，加剧党政摩擦，打击彭、张集团，这时我对如何帮助何键抗击彭张集团，攫取湖南党权，暗中已在考虑。我当时已任候补监察委员，虽然起不了大的作用，但站在省党部内面，对于党内斗争究有相当便利；同时毛飞虽已脱离省党部，而精神方面仍与省党部及各县党员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派系斗争的有利条件。因此我同意毛飞的建议，大家合作对付彭、张集团，以进行党内斗争，来转移他们对何键政权的攻势。

一九三二年春，我和毛飞、黄家声、殷德洋、刘宝书等经过多次商谈，确定了进行组织活动的大体计划：

总的策略：首先和过去的“反小组”分子进行合作，对抗彭张集团；然后积极争取友军，积蓄扩大力量，为在下届选举中争取多数代表，夺取党权创造条件。

在方法与步骤上，我们打算利用一个有全省性的合法社团在各县建立分支机构。这个机构表面上是按照社团性质进行社会活动，实际上是干派系斗争的勾当，即利用它来发展我们集团的基层

力量，与各县县党部对立，进而夺取党务领导权。恰好当时有个全国道路协会（以下简称“道协”）湖南分会，我以省公路局长的身分担任着该会会长。我们认为这个合法的社会团体正合利用条件，决定利用它。首先在有条件的（主要是有与我们有关系的人能够挂上钩的）各县成立“道协”支部，发展组织。

计划商定后，由我告诉何键，取得了他的同意。所需活动经费，也由我负责请何键批交四路军总指挥部经理处作特别费拨付。起初是每月一千元左右，以后增加到二、三千元不等，不足时临时批发。这笔款子的用途，以视察、联络旅费开支最多。此外，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办过两次全省性的选举，每次用了万余元。统计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六年间所花的钱，共达二十万元左右。

方针、计划定了，活动经费也有了，我们就开始进行活动。省会方面，以“道协”分会为公开机构；我以会长资格主持一切。毛飞、黄家声、殷德洋、刘宝书等虽然没有加入“道协”，但他们都是乙派首脑人物，遇有重要问题，我们总是共同商量。分会设总干事一人，由我委派公路局科员萧敬一充任（萧系中共叛徒，对于群众团体的工作有些经验，曾托人向我表示愿意搞“道协”的工作，故派他担任此职）；举凡“路政的研究、宣传、促进”以及各县“道协”支部的接洽事项，均由总干事负责办理。另外设一个对外不公开名义的干事，专门负责计划和指挥各县“道协”支部的秘密工作，萧敬一介绍时任省党部干事的蒋固担任了这个角色。

“道协”分会的公开会址最先设在长沙市万福街省商钱局隔壁；那里只是挂着一块空招牌，萧敬一有时在那里办一办公，实际上一切重要问题的商量差不多都是在我家里进行的。为了便于

秘室策划，我们还在长沙市区设了一个秘密办公地点，最初在高井街十六号，蒋固每天晚上一个人在那里工作，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也间常到那里去研究问题和听取汇报，一般“道协”会员则不知道有这个地方。一九三四年选举以前搬到府后街九号，选举之后又搬到浏城桥某号，最后搬到通泰街二十一号，乙派的派系活动就是在那里终局的。其中府后街和通泰街两处地方，到后来已经成为半公开的机关了。

各县筹设“道协”支部，多系通过我们的私人关系，物色在当地有代表性和能力较强的国民党员一二人负责进行筹备；通常是把物色好的人约到长沙“面授机宜”，也有用通讯或派人去联系的。“道协”支部成立后，除了搞一点应有的表面工作之外，主要工作就是发展会员，与县党部唱对台戏，争领导权。

我们发展“道协”会员，是以过去的“反小组”为基础；凡属与“反小组”接近、具有一定活动能力的国民党员和非党员，都是我们发展的对象；对于“小组”和与“小组”接近的分子，则一概不予接收。我们当时有句口号：凡在“反小组”的旗帜下，只要在当地社会上大体能起作用的，任何人皆可合作。这句话可以说明我们发展会员的原则和标准。这一点对于壮大乙派的力量，击败彭张集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如上所述，彭张集团平日排除异己过甚，树敌太多，故只要打出反对彭、张的旗帜，追随者便大有人在。其次，何键掌握着湖南的政权，可以吸引一些“攀龙附凤”的人，并促使一些摇摆于甲乙两派之间的人倒向乙派，这对乙派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条件。

我们在发展组织中，除了广泛利用私人关系进行串连以外，还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方式，也可说是无孔不入，主要的如：（一）对各县有矛盾的派系中的人物，双方争取，兼收并蓄，例如长沙

一师系的缪崐山和长师系的盛先茂，邵阳党务方面的杨梓和教育界的黄甲，郴县新旧两派中新派的曹潮和旧派的范德材、张昱，城步两大家族萧姓的萧浩然和戴姓的戴佐文等，都被我们一起拉过来了；（二）利用地方封建势力代表人物的影响拉人，例如汝城的胡宗霖原来与我们并无关系，就是由于胡凤璋（湘南著名大恶霸，解放后被镇压）的一封信而加入乙派的；（三）取得当地有社会地位的党外人士的帮助进行发展，例如临湘的高大球曾帮助我们发展了临湘、岳阳、湘阴三县的组织，大大增强了乙派的力量。此外，我们在发展中对于骨干的选择，一般都比较慎重，力求以较强的干部去对付较强的敌手，如在湘潭我们以王洪波、王蔚佐对付甲派的陈大榕，在衡阳以刘翥唐对付甲派的万励，结果都作出了较好的成绩。同时我们对于小县份的工作也很注意，象临武这样的小县，一旦有机会发展，我们也不放过。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甲派树敌过多，乙派采取了“力争友军、孤立敌人”的策略，何键政权的支持，以及乙派在发展工作中的无孔不入，“道协”在各县的发展，相当顺利。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选举以前，全省已有四十多县成立了“道协”支部，其中有不少的支部，力量超过了甲派控制的县党部的力量，使得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便成了后来甲派丧失湖南党务领导权的决定性因素。但也有一些县份，乙派的工作始终没有做进去。如常德县，因为是张炯的家乡，甲派的工作基础比较坚实，县党部的干部宋华国、熊刚毅等能力亦强，乙派派去的“道协”负责人（名字已忘）与宋、熊比较，能力声望均逊一筹，工作经年，毫无成绩；衡山、益阳等县，也因物色的干部不得力，工作未能开展。

“道协”究竟发展了多少会员，当时没有确切统计，估计不

下一二千人，其中公路局系统的职员就有一百多人。这些“道协”会员，当然都是乙派的喽啰。这样一来，乙派就不再是几个上层人物的小圈子，而是一个相当庞大的集团了。乙派本来没有一个成形的组织，现在虽然利用了“道协”这个组织形式，组织仍然是不严密的。乙派的成员相当复杂，除了国民党ＣＣ和甲派分子以外，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多数是国民党员，也有非国民党员；国民党员中的乙派分子固然多数加入了“道协”，但也有未加入“道协”的。由于湖南教育界是ＣＣ和甲派固有的地盘，乙派很难插足，因此乙派（“道协”）发展的对象，只能以社会人士为主。从其来源看，有些是原来就与乙派的领导人和干部有私人关系或政治关系，自然地跟过来的（毛飞在省党部任职期间有他的一批干部，大都跟过来了；还有一些人是跟着我跑的）；有些是原来隶属甲派，后来因内部发生矛盾而投效过来的（桃源的王德清便是一例）；而更多是中间分子被我们争取过来的。这些人参加乙派的动机又各有不同：有些人是由于对甲派的作风不满，而对乙派存有“希望”；有些人是因为与彭、张等人有个人仇怨，完全出于泄愤；有些是于名逐利之徒，因见何键在台上，故而趋权附势；有些人则是碍于私人情面，有朋招之，不得不来。乙派以这样复杂的分子集合而成，虽然在同甲派作斗争时能够基本上保持一致，但一旦涉及个人利害问题，便不免同床异梦，发生矛盾。这在后面还要加以叙述。

乙派是一个以何键为后台，为何政权在党务方面植党营私的势力；但并非所有何键政权中的高级军政人员都是乙派成员，如曹伯闻、张开琏等，都是何键方面的人，却没有加入乙派。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同情支持乙派的；有的是两面讨好，都不得罪；有的甚至在感情上更接近甲派一些。乙派的首脑人物，实际上只

有刘岳厚、毛飞、黄家声、殷德洋、刘宝书等几个人；其中刘、毛、黄三人又是主要负责人。对于他们的出身以及各人在乙派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应该在这里作一简单的介绍。

刘岳厚　湖南醴陵人，一八九二年生，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湖大前身）土木科毕业；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在湖南各公路任工程师；何键任湖南省主席后，刘以同乡关系当了公路局长。一九三一年国民党中央圈定湖南省执监委员时考虑到何键方面的人也要适当照顾，根据彭国钧、张炯等的意见，圈定刘为候补监察委员。这是刘与湖南党务发生关系的开始。由于刘具有较大的政治野心，与何键又有较深的私人关系，于是在毛飞、殷德洋的怂恿下便搞起乙派活动来了，并且成了乙派中运筹决策的主要人物。随着乙派对甲派取得的胜利，刘于一九三三年当选湖南出席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34年又被选为国民党湖南省执行委员。1937年ＣＣ派赖琏任省党部特派员接管湖南党务后仍保留空头委员名义，至1939年李毓尧任省党部主任委员时去职，从此脱离了湖南党务关系。

毛　飞　湖南沅江人，大概生于一八九四年，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曾在广西省政府充主任秘书有年；一九三〇年回湘任省党部秘书。一九三一年一度钻得省党部执行委员，由于彭张集团的暗中破坏，刚刚发表，又被免职。毛受此打击后，渐与刘岳厚、殷德洋等接近，复利用他的妻子唐竹邨跑何公馆，与何键的内眷接近，从而与何拉上了关系。毛、殷二人对于乙派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毛在乙派的活动中，通常处于出谋献策的地位。由于他具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和投机性，与ＣＣ又有相当的历史关系，他搞乙派完全是出于对彭、张等人的报复，在一九三四年乙派竟选胜利当了省党部执行委员之后，又逐渐与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